

燕赵文化丛书

YANZHAO WENHUA CONGSHU

丛书主编/胡克夫 杜荣泉

燕赵文化史稿

YANZHAO WENHUA SHIGAO 魏晋南北朝卷

陈瑞青◎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燕赵文化丛书

YANZHAO WENHUA CONGSHU

燕赵文化史稿

魏晋南北朝卷

陈瑞青◎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赵文化史稿. 魏晋南北朝卷 / 陈瑞青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12

(燕赵文化丛书)

ISBN 978-7-5545-0670-7

I. ①燕… II. ①陈… III. ①文化史—河北省—魏晋
南北朝时代 IV. ①K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379号

燕赵文化丛书

燕赵文化史稿

——魏晋南北朝卷

陈瑞青/著

责任编辑 袁淑萍 王福仓

特约编审 胡克夫

装帧设计 信易BOOKS DESIGN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排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制 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90千字

印张 20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5-0670-7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伟大创造。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就辉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燕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的地域范围大致是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大海。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山东省、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广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为燕赵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燕赵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周边的齐鲁文化、河洛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关东文化水乳交融，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燕赵文化的若干特征：其一是平原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相互会合；其二是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其三是元、明、清以来，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既与传统的地域文化相互结合，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其四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撞击中，燕赵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策源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燕赵文化》丛书是经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批准，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负责组织编纂的燕赵文化系列研究项目。其目的就是为了弘扬和继承中华

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从中华文明发展史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论述燕赵文化的内涵、地位、贡献和创新、发展演变及其特色，以及对不同文化的交流、影响与传承，从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全面深入研究、不断丰富发展燕赵文化奠定基础。

丛书分门别类，纵贯古今，包括学术著作、知识读物、古籍文献整理等三个方面，分为若干系列，如：社会意识形态系列、工艺技术系列、历史人物系列、民族文化系列、城镇地域文化系列、近代文化系列。每个系列由若干个专题组成，每个专题为一册，分册编写，分辑出版，汇集一体即为燕赵文化研究门类齐全、蔚为大观的百科全书，成为现代河北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丛书编写总的时限：上自人类的起源，下至 1919 年。不同系列、不同专题，则根据各自特定的内容，确定具体时限。

编写《燕赵文化》丛书，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文化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我们将团结和依靠在燕赵文化研究领域有学术专长的专家学者，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组织实施。我们相信，《燕赵文化》丛书的陆续出版和问世，不仅有利于全面推进燕赵文化研究，有利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必将对 21 世纪的河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燕赵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杨泽江 2002 年 1 月

导 言

三国魏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并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即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为西晋，但因十六国连年战乱，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的历史时期。5 世纪时，由北魏的统一和相继分裂而形成的北朝与西晋王朝偏安江左后被宋、齐、梁、陈替代而形成的南朝相互对峙。政治的不稳定与时局的混乱动荡而带来的是经济普遍衰退，但在文化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故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后来大都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异质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文化。民族大融合，胡、汉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燕赵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起，某些异端思想也在特定历史时期得以流行，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相对自由并趋向多元化。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成为统治思想，民间风气也随之俯仰。纷乱多元的社会，也给宗教的发展蔓延和传播创造了极好时机，社会上各阶层均对佛教有了相对迫切的需要和广泛的接受。随着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地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历史进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象征，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兴盛，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发展变化。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

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地理学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使北朝经济超过南朝，最终由北方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为隋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及文化基础。

一 经济的逐步恢复为燕赵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经济与南朝经济相比，经历了一个由破坏到复苏的曲折过程。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经历了黄巾大起义及社会动荡后遭到极大的破坏，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甚至出现“百姓相食”的悲惨局面。在魏晋南北朝将近四个世纪中，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曲折历程。

第一次战乱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始于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止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国北方，历时十八年。实际上，东汉末年大规模战乱是从东汉中平元年黄巾大起义开始的，自此而后，便国无宁日。就黄巾起义而言，当其主力失败之后，青州、河北等地的农民军仍坚持浴血奋战，规模一度甚至大于张角等领导的主力。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前，由于东汉大土地所有制急剧膨胀和政治腐朽，造成社会上流民千百成群，往往以万计数，裸行草食，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大大小小的军阀“饥则抢掠，饱则弃余，无终岁之计”¹。人民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饥荒迅速蔓延。人祸加深了天灾，旱、涝年年不绝，风、雹时时为灾，飞蝗成患，瘟疫猖獗，出现“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²。持续的大饥荒，致使北方地区呈现空前的凋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³。长期战乱，造成人口明显锐减。史载，“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

1 陈寿：《三国志》卷一《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14页，中华书局，1982。

2 范晔：《后汉书》卷十七《五行志》注引《魏陈思言》，中华书局，1982。

3 《三国志》卷十五《魏志·司马朗传》。

而无民者，不可胜数”¹。

汉魏之间，由于社会生产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出现了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拥兵而立的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针对这些问题，东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祗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以此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故曹操曾言，“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²。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还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并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防止豪强兼并小农。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确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³。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次战乱始于晋永平元年（291年）的“八王之乱”，继之而来的是“永嘉之乱”和十六国的纷争割据，直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始告结束，前后共计一百四十八个年头。其时间比第一次战乱更长，祸害更烈，尤其是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割据政权犹如车水马龙般地更迭。长的不过二三十年，短的仅有两三年。除了前秦短期统一北方之外，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数个政权对峙纷争的局面。西晋末年的战乱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多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⁴“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

1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2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峻传》裴注引《魏武故事》。

3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4 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

沟壑”¹。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前夕，依然是“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²。

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曾出现过两个恢复年代，即石赵政权和苻秦政权时期。石勒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杰出的少数民族帝王，他以汉族贤明皇帝为楷模，重视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五胡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石勒施行的许多措施，系效法西汉。如在所占的州郡查明户口，实行田租户调的征收。公元314年，后赵规定，“户出帛二匹，谷二斛”，比西晋、曹魏时的租税还要轻。在农业生产和发展遭受破坏的情况下，轻租税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石勒实行鼓励农业生产的举措，常常派人或亲自巡行诸郡劝民农桑，接见并奖励“力田”者。经过石勒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河北一带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有所恢复，出现“租入股广”的新气象。乃至修撰《晋书》的唐初诸公，也不得不承认石勒为“一时之杰”，发出“古之为国，曷以加诸”³的赞叹。

前秦苻坚统治前期，以“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⁴为基本国策，他支持王猛抑制豪强，整饬军政，强化王权，命地方官荐举孝悌、廉直和长于文学、政事者，进行考核，“得人者赏，非其人者罪之”。由是“内外之官，率皆称职”。苻坚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地区之人采用怀柔政策，收用不少他族或投降的人为文官武将。如前燕将领慕容垂避害来投，拜冠军将军，封宾都侯；羌族姚萇归顺，任为龙骧将军。同时，还企图在思想意识上以汉化融合各族，提倡儒学，广兴学校，令公卿以下子孙入学，曾亲临太学考试学生优劣。关中为前秦的根本所在，因多年混战，生产废弛。苻坚“劝课农桑、赈恤穷困”，行区种法，兴修水利，遂使关陇地区经济有所发展，国力充实。由此，“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

1 《晋书》卷一百〇九《慕容皝载记》。

2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

3 《晋书》卷一百〇四、一百〇五《石勒载记》。

4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相对于祸乱横流时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北魏在恢复了对河北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之后，鉴于河北地区早已是汉文化和封建经济较发达地区之一，为了吸收汉文化和适应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在政治上置行台，修直道，建行宫，广封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统治的政治措施。

北魏中期以后，开始大量迁徙人口，以充实河北，计口授田。例如，魏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奚斤等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河西胡曹龙等部被镇压，同样被徙“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²。显然，这些被徙者是令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延和元年（432年），北魏击灭北燕，徙“民三万家于幽州”。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反抗被镇压，将近五千余落被“徙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六年（445年），魏师“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³，然这次徙民之数不明，估计规模不小；七年（446年），北魏“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十二年（451年），拓跋焘兴师南下，兵锋直达长江北岸，“降者不可胜数”，“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⁴。依《魏书》所记，似乎这次没有被安置于河北者，但为时不久，便发生“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证实被安置在河北的不少，最低限度也有“五千余家”。延兴元年（471年），沃野和统万两镇敕勒反抗，遭镇压后被徙“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⁵。同时，北魏还通过救助灾荒的形式来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此后，因连年旱涝，冀、定二州饥荒严重，太和七年（483年），魏孝文帝下令开仓赈济，沿路施粥，“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冀州上言，“所活七十五万一

1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2 《魏书》卷三《太宗纪》。

3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4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5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千七百余口”¹。《魏书·张彝传》载，魏孝文帝校比天下户口，冀州“最为大州”。既然冀州人户已为天下之冠，其人口数当超过定州，远在百万以上。北魏孝明帝元诰时，冀州刺史元晖“检括丁户，听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²。五万匹相当于五万户的户调。“听其归首”，便得五万，冀州户口之多，可见一斑。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延和二年（433年），张昭出刺幽州，“时幽州年谷不登，州廩虚罄，民多菜色……乃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余运外境，贫弱者劝以农桑。岁乃大熟”³。北镇起义失败后，“时北镇饥民二十余万，诏（杨）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⁴。足见当时的冀、定、瀛三州粮食充足。同时，北魏还在河北地区兴修水利。北魏宣武帝元恪时，杨椿曾受命“监修白沟堤堰”⁵。枋头大堰自曹操修成以后，曾一度废弃，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重新修造，“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并开凿了新的渠道，将水流一分为二，一入清水，一入淇水，“上下灌注”，互相调节水量，“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⁶。

除此之外，北魏还在河北地区实行军屯。皇始二年（397年），道武帝拓跋珪“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巨鹿，积租杨城”⁷。其后，河北军屯不断扩大，“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慑。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杨）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定）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⁸。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断兴兵南下，为确保粮食供应，“发河北数

1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2 李延寿：《北史》卷十五《昭成子孙·元晖传》，中华书局，1974。

3 《魏书》卷三十三《张蒲传》。

4 《魏书》卷五十八《杨昱传》。

5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附弟椿传》。

6 酈道元：《水经注》卷九《淇水》。

7 《魏书》卷二《太祖纪》。

8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附弟椿传》。

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¹。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北魏时期的河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史称，“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借河北”²。

第三次战乱始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的北镇起义，止于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历时二十七个年头。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居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愤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镇民破六韩拔陵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³。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彧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彧大败，被朝廷罢免。这时，北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李崇副手崔暹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率领部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⁴，并派黄门侍郎酈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治今山西忻州），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北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陷入起义浪潮的冲击之下。北魏王朝经过重重打击，“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烬”⁵。

1 《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2 《魏书》卷十五《常山王遵传》。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九梁纪五高祖武皇帝五普通四年（523年）四月，中华书局，1958。

4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纪五高祖武皇帝六普通五年（524年）八月庚寅。

5 《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东魏、北齐时期，河北地区的经济得以再次复苏。东魏、北齐统治者在河北充分利用地域经济特点，采用多种经营方针，在“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贍”¹。东魏、北齐均定都于邺，邺都更为当时工商荟萃之地，风俗流宕，浮华日滋。北周武帝灭北齐诏里称，“并、邺二所，华侈过度”²。隋初时，杨坚亦曾对关东的城市富庶不满，“恶其殷盛”，“禁游食，抑工商”³。北齐时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反映普通农户的生产活动已经和市场紧密结合，货币关系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北齐时期名目繁多的商税也开始征收，说明此时的商业和多种经济成分较发达。这一时期的河北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成为北方经济重心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自孝文帝以来直至隋文帝时期，均田制在北方断续地推行，自耕农比较多，所以一直到隋统一前夕，可以说正处于由恢复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呈蒸蒸日上之势，政治生活也比较正常和清明。而南方的陈朝则正处于危机阶段，两厢交战，谁胜谁负，几乎可以说是无待筮龟⁴。河北经济的复苏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北齐书·儒林传》所录十五人，有十三人出自河北。这说明，河北地区不仅在南北朝后期显现出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农业经济基础较为深厚，商品经济乃至学术文化也都达到了全面综合发展。

二 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为燕赵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两汉以来，自甘肃、青海沿边以至辽宁的北部边境，散布着匈奴、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魏晋时期，这些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受着中原王朝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奴役或压迫，并开始向内地迁徙。西晋末年，当中原王朝统治趋于崩溃之际，这些少数民族纷纷揭竿而起，反抗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少数民

1 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

2 令狐德棻：《周书》卷六《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1。

3 《隋书》卷五十六《令狐熙传》。

4 胡如雷：《隋朝统一新探》，《隋唐政治史论集》，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族贵族也趁机起兵，向黄河流域侵扰，于是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迁徙。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幽冀诸州境内民族杂居，其名号可考者，有匈奴、鲜卑段氏、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羯、氐、羌、东胡、乌桓（乌丸）、丁零、索头、鲁阳蛮、高丽徒何、北部民、陇西屠各以及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柔然、库莫奚、契丹、山胡等二十多种。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百万以上¹。这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河北建立政权的有后赵、前燕、后燕、东魏等，对河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北地区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远在东汉末年已经开始。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蹋顿降服其众之后，“及幽州、并州（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²，河北当为乌丸主要的迁居地。这可以视为河北地区乃至北方地区民族大迁徙的先声。

民族大迁徙的高潮发生在十六国时期，当时河北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其中，石勒、石虎统治时期的迁徙规模较大，次数也较多。刘汉建元元年（315年），石勒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刘汉光初元年（318年），石勒攻靳准，徙羌、羯降者十多万落于冀州。后赵七年（325年），石虎克石梁，擒前赵中山王刘岳，俘获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后赵太和二年（329年），石虎破上邦（今甘肃天水），杀汉刘熙、刘曜及其王公卿校三千余人，徙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二州。后赵建平四年（333年），石虎徙秦、雍民及氐、羌十多万户于河北、中原，以氐帅苻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西）；羌帅姚弋仲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潞头（今河北枣强东北）。后赵建武二年（336年），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后赵，石虎散其众于冀、青等六州。建武四年（338年），石虎扰令支，徙段氏民二万户于中原。

后赵冉魏之乱以后，原来迁徙河北的各族人口又大规模外徙，后赵太宁元年、前燕十三年（349年）十一月，司、冀二州氐、羌流民十余万相率西归。

1 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的移民和民族融合》，《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

2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

冉魏永兴元年（350年）七月，鲜卑人段龛因石氏之乱，率部落自令支南徙广固（今山东淄博东）。八月，代郡（今蔚县东北代王城）人赵楷率众三百多家投奔后赵并州刺史张平。冉魏永兴二年（351年），所徙各州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陆续还归本土。

前燕占据河北后，慕容氏又屡将降人内徙河北幽、冀二州。前燕元玺元年（352年），慕容儁徙部分军中兵民家属于蓟。元玺三年（354年），前秦刘宁率户三千至蓟归燕。元玺五年（356年），慕容恪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

前秦建立以后，“分氐户于诸镇”¹，其政权所及之处，氐族也随之而至。河北较大的民族内徙有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分三原、九峻、武都、沂、雍氐十五万户散居诸方镇，幽、冀二州各三千户²。外迁有前秦建元六年（370年）十二月迁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建元二十一年、后燕二年（385年）七月，苻丕率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入晋阳。

后燕慕容垂占据河北后，后燕建兴二年（387年），慕容垂徙乌桓八千余落于中山。翌年，后燕废代郡，将包括各族人口在内的当地居民全部迁于龙城（今辽宁朝阳）。建兴四年（389年），后燕慕容德、慕容麟徙贺讷部众数万于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建兴六年（391年），又徙贺染干部众于中山。后燕被灭以后，北魏“分徙吏民及徙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³。原来居住在河北地区的慕容鲜卑被大批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北魏将慕容腾这支前燕支庶安置于中山，招抚后燕民众及其他民众。数年后留居河北的慕容鲜卑数量增加，史载：“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人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⁴。

1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2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3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4 《魏书》卷五十《慕容白曜传》。

北朝前期，民族迁徙的主流和特点是鲜卑拓跋部的大规模进入河北及中原地区，鲜卑拓跋部成为中原的统治民族和部落，但其他各少数民族和其他鲜卑部落的迁徙也仍然频繁。例如，公元398年，拓跋珪徙幽冀等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实代。北魏永兴五年（413年）五月，奚斤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西山，徙二万余家于大宁（今河北张家口）。泰常至太延（416—440年）年间，拓跋氏先后五次伐北燕，将辽西、辽东数十万口迁入幽、燕等州。太平真君（440—451年）年间以后，随着北魏在河北地区统治的稳固和及其军事重心的南移，河北中、南部成为其安置降民的主要地区之一。对于那些不服从其统治的河北居民及少数民族则多被徙于北地。例如，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徙北部民五千余落于冀、定、相等三州为营户，翌年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平城。兴安元年（452年）十一月，徙陇西屠各王景文部众三千家于赵、魏。皇兴五年（471年），徙沃野、统万二镇叛兵敕勒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景明三年（502年），徙鲁阳蛮万余户于幽、并诸州及六镇。北齐天保三年、四年（552—553年），高洋率军先后击败库莫奚和契丹，分别俘获四千人 and 十余万口，虏获杂畜数百万头，这些人口被分别配置于河北诸州郡。

就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实现的形式无论是否意识的自然过程，还是有意识的自觉过程，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激烈动荡的产物，特别是各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更可谓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它不仅削弱或摧毁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而且最终模糊了长期存在于各个民族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使之趋于消失，北魏末年爆发的北镇各族人民起义和河北流民起义就加速了整个北方地区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这两次起义，历时七八年之久，参加者的民族成分包括鲜卑、汉族、匈奴、敕勒、氐、羌族等各族兵民，战场主要在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北镇起义失败之后，仅分徙河北冀、定、瀛三州就食的兵民就有二十余万。这两次起义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北魏统治集团和胡汉高门世族的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北魏主力军，尤其是河北流民起义，人数不下百万，规模和声势浩大，先后攻围克陷柔玄、怀荒、御夷、幽、燕、朔、恒、定、冀（包括南冀州、东冀州）、相、瀛、殷、沧、光等数十州郡镇，震动了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在内的

整个中原，使原来严整有序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界限发生了剧烈变动。起义过后，原来长期存在于河北的匈奴、敕勒、氐、羌族、柔然、库莫奚、契丹、山胡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之名多数不再出现于河北地区，以后又历经东魏、北齐至隋，鲜卑族也全部融入汉族，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历史上新的大一统隋唐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民族基础和社会基础。

民族大融合历史现象为幽冀诸州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从居民姓氏上说，更加复杂多样，除本地崔、卢、李、封、邢、刁、祖等大姓外，徙来的关中大姓有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还有慕容氏及改用汉姓的鲜卑元、陆、穆等，这些姓氏均系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才在河北地区逐渐多起来的。从宗教上看，促进了佛教在河北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思想、佛教文化被汉人接受，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中国本土佛学思想家，如释道安等。从建筑艺术上看，渐次吸收了西域的建筑风格，佛塔建筑开始在河北出现。北齐在邺城华林园仿龟兹国雀离佛院建雀离佛寺，还在邺西鼓山、凤凰山上建南、北响堂寺和娲皇宫，将西域、北魏石窟艺术同中原寺庙建筑风格相结合，窟、殿、楼、台、阁、榭等浑然一体，既有宗教建筑特色，又呈现中原园林风光。在衣食住行上，许多汉人食肉、皮衣、着毡，生活方式和服装样式大都融汇了胡人文化有益的方面。在语言方面，《颜氏家训》反映出邺下有汉人教小儿鲜卑语的风尚。在家庭内部男女地位上，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更大。汉族长期受儒家礼教和宗法制的约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后赵、前燕、北魏、北齐统治者虽曾几度禁止皇妃干预朝政，但在民间社会习俗中，女子地位仍较高。《颜氏家训·治家篇》云：“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所谓“恒、代遗风”，实即鲜卑旧习，反映了少数民族习俗对汉族方方面面的渗透及影响¹。

对经济的影响，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为畜牧经济因素有所加强。西晋时期，石勒“与牧率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尝佣于武安、临水，